

第15章 结 论

谢 宇* 张春泥**

研究中国社会的西方学者通常有两类人。一类是“中国通”，这其中不单有学者，还包括知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商人。他们在中国留下过难忘的足迹，接触过许多平凡或不平凡的中国人。他们几乎熟知一切西方关于中国的著作，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见解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国人。他们是优秀的质性研究者，善于洞察、善于提问、善于解读。他们的研究倾向于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他们能够从宗族与家族、官僚科举制、儒家礼教、共产主义传统等文化或制度传统中寻找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对中国社会理想型(ideal type)的概括，这些理想型可能是古老的帝国王朝，也可能是1949年后的新中国，这些理想型常被其他作者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的起点。

另一类研究中国的西方人却是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来审视中国。他们研究接触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数据，而不是现实的中国人。与“中国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不同，他们强调的是社会现象的普遍性，要以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但这一普遍性的判断准则通常是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而言的，确切地说，这样的视野其实是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即现代化提供了一种不同国家间趋同的力量，使中国也变得与西方社会越来越相似。这些学者

* 谢宇：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千人计划”讲座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

** 张春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通常使用数据和统计模型等更为客观的研究工具,而中国在他们的跨国研究计划中不过是一个数据点,中国文化或制度也被简化为若干变量。这些学者的工作让研究中国变得不再那么讳莫如深,西方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标准化的研究过程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对中国的研究。对中国市场转型的讨论就是一个经典范例,在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发表之前的 39 年里,美国顶尖的三个社会学刊物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和 *Social Forces* 只发表了 19 篇中国研究的论文,平均每两年一篇;而从 1988 年到 2002 年的 14 年里,这三个期刊发表了 45 篇中国研究的论文,平均每年 3 篇(边燕杰,2002)。无疑,这场讨论让更多的西方学者参与到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也给中国和西方的学者提供了对话平台。然而,套用西方的框架来研究中国有时难免陷入对现象浅尝辄止的理解,甚至可能得出让中国和西方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的误导性发现或结论。

现实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让即便是优秀的学者对它的认识也不免有局限。上述两类学者笔下的中国都与真实的中国社会存在差距。前一类学者看到的是独特性,他们描述和试图强调的是中国和西方社会之间的组间差异,强调这一差异来自于文化和制度传统,而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差异性和变化性不够重视。而后一类学者看到的是普遍性,他们在立论上尽可能地缩小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差异,并强调现代化的趋同作用,却没有看到表面现象背后深刻的中国文化、历史和制度的发展逻辑。不可否认,一方面,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特征,以及复杂的制度发展背景。某些历史、文化或制度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而另一方面,中国从 1978 年经济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也是广泛、迅速而深刻的,这一变迁的重要性不亚于 14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这些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转折(Xie,2011)。经济发展、人口转型、教育扩张等诸多领域的重要变迁让当代中国社会已渐渐远离人们对古代中国或革命中国的想象。人们需要切实地去调查和了解当代中国的变化,系统、客观地观察和记录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不是先入为主地用中国传统或西方框架去解读或揣测。

中国正在经历的变化是丰富而复杂的。今年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团队基于 2010—2014 年 CFPS 数据对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家庭支出与消费、家庭



财产、房产与生活满意度、社会经济地位与死亡、生育意愿与生育动机、生育政策与生育行为、认知功能的发展、婚姻与家庭、互联网不平等等多个议题进行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从这些议题的研究发现就可见一斑。

首先,中国的变化已经逐渐偏离某些理想型的框架。比如,城乡二元结构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它不仅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而且在市场转型中进一步强化。在这一观点看来,中国农村在经济发展程度、社会环境和提供给人口的流动机会上都远落后于城市。但从CFPS三期数据的比较上看,城乡差距正在缩小:尽管农村家庭收入水平仍明显不及城镇家庭,但农村的收入增长幅度大,从而城乡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而且这一差距的缩小很可能是2010—2014年全国收入基尼系数下降的来源之一(第2章;Xie et al., 2015)。尽管农村家庭在支出水平上明显低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属于享受型和稳妥型消费的比例低于城镇家庭,但城乡家庭的支出结构已经相差无几(第3章),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城里人消费什么,农村人也有相似的需求,而本报告第11章提到,2010—2014年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在农村人口中的大幅增长也佐证了这一点。CFPS的认知测试结果显示,从“65后”到“90后”人群在认知功能上的城乡差异也在逐渐缩小,这与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第9章)。虽然城乡差距在某些方面有所降低,但城镇和农村内部的差异却在扩大。城镇人口贫富差距的扩大早已被过往研究所认识到(Xie & Zhou, 2014),但农村内部的差异却讨论得不多。本报告显示,2012—2014年农村的基尼系数有所上升(第2章),农村高收入家庭在消费上的提升非常明显(第3章)。上述发现并不是说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彻底改变,本报告的分析结果仍显示城乡居民在房产与生活满意度(第5章)、生育男孩的偏好(第7章)、对子女的教养行为、儿童的自尊程度和成就归因(第14章)等多方面存在重要差别,但新的变化提示我们需要逐渐跳出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僵化认识,要开始意识到城乡发展的趋同性并关注农村社会内部的逐步分化。

其次,制度的遗产对某些领域的影响会相当持久,而对另一些领域的影响却已削弱。中国虽然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但体制对分配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本报告对家庭财产的分析发现,体制内的工作对家庭财产的积累和向上流动仍有优势(第4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体制内的优势即便



在失去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撑后仍然存在积累效应。但不是所有制度的产物都能持久。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男女平等观念近年来却发生了“向传统回归”。本报告第 10 章的分析显示,女性的经济独立观念在较年轻一代和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反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然而,上述制度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经验发现仍不能作为对制度本身的评价,因为社会后果的演化和改变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再次,重大的变迁不仅发生在经济和制度领域,也发生在家庭和私人生活领域。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孝道为先、男尊女卑等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父母包办婚姻已经基本消失,互联网成为结识配偶的新媒介,这些变化尤其发生在年轻一代中。在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增加的同时,中国人初婚年龄的推迟和不婚、同居、离婚等现象均有所上升,中国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性有所下降(第 10 章)。在性别领域,男女教育趋同已经悄然实现。从“65 后”到“80 后”,男性在识字和数学水平上相对于女性的优势越来越小,识字水平在“90 后”已经出现了女性占优势的局面,而数学水平的性别差异也在“90 后”一代基本消失(第 9 章)。与经济和制度变迁相比,家庭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变化更切身地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更涉及中国人生活方式、观念和人际关系的改变。因此,这一领域的变化也不容小觑。

最后,在不平等的诸多后果上,社会经济地位的梯度效应在中国已与西方社会趋近,这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社会分层逐渐变为以教育、收入和财富为基础,而在这些指标上享有较高地位的群体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与地位低的群体的差距也逐渐显现出来。比如,在疾病与死亡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相比,更少患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其死亡风险也较低,因为前者相对于后者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医疗条件等优势(第 6 章)。在互联网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上,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也享有明显的优势(第 11 章)。在生育意愿和行为上,学历越高的人群生育的经济动机越小(第 7 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妇女的生育行为越现代,她们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越少,也越可能推迟生育(第 8 章)。

在上述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变迁的来源是复杂的,既有现代化



的影响,也存在对传统制度和文化的路径依赖。这些变化的方向和结果也是复杂的,在一些方面,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距在减小,但在另一些方面中国社会有自身的变化方向。我们的报告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描述仍然是管中窥豹,中国还有很多现实的异质性和变化性有待了解。也许有的变化在当下的时点来看微不足道,但人类社会有很多深刻的变化都是从微不足道的改变开始。任何我们当下捕捉到的社会变化,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制度领域,还是在家庭或私人生活领域,都有可能预见中国未来的走向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者不应该轻视对社会总体的动态描述。

描述性的工作需要基于系统的观察、客观和科学的数据采集。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变化,CFPS不断改进和完善其调查设计和执行方案。尽管CFPS是以美国的PSID(Panel Survey of Income Dynamics)这一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追踪调查为范本,但没有照搬其设计和问卷内容,而是发展出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调查设计和问卷模块。例如,考虑到家庭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中国家庭内部经济转移的普遍性,以及中国父母与子女、孙子女之间较强的关系纽带,CFPS将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均作为访问对象;考虑到中国人对家庭界定的多重标准,CFPS设计了能够采集完整家庭关系的调查表;为了兼顾地区差异和全国代表性,CFPS的抽样框分为“大省”与“小省”,等等(谢宇等,2014)。CFPS还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适于中国人回答的多种心理量表,这些量表具有比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针对中国人主观态度和心理因素的后续实证研究(第14章)。而作为一项追踪调查,CFPS非常重视数据质量,对样本流失的原因作专门研究并设计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案(第12章)。我们在历次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中设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调查设计和数据采集的经验,让读者了解这一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有人批评实证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现象的量化数据采集和分析只不过是重复人们都知道的“常识”。诚然,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通常不会远离人们可以感知和体验的日常生活,每一位身处其中的人都可以对社会事件和群体有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但我们不能因为研究发现不够高深莫测或一鸣惊人而认为它不是知识。事实上,即便是所谓的“常识”议题也同样存在争议,每个人也未必能从个人经验得到准确的答案。社会科学对社会的研究时常关



注两类问题——“是什么”和“为什么”。前者是要描述现象在总体中的分布，既要概括出集中性(如平均数)，也要描述其离散性或差异性；后者是要解释现象、推断和检验因果关系。事实上，这两类问题都很难从个人或周围人的生活经验中得到准确的回答。普通人在对现象“是什么”的观察和判断上通常会忽略基本的统计事实，也会因囿于自己生活和交往的圈子或群体而难以摆脱认知偏差，这在许多心理学研究中都得到证实(卡尼曼, 2012)。即便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讨论，也都有可能由于抽样偏差或分析不够严谨，造成不同调查结果差别极大，三年前的基尼系数之争就是一个例子。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公布的中国收入基尼系数高达0.61，这一数字轰动海内外，而国家统计局随后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数却还不到0.5(Xie & Zhou, 2014)，双方的估计在均有大规模数据支撑的情况下都相差如此悬殊，更不必说网友和学者对“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到底有多高”的看法更是众说纷纭。由此可见，对社会现象基本情况的描述都不乏争议。而涉及因果推断的“为什么”则是一个更复杂的难题，因果推断要经得起反事实的推敲，而个体的反事实结果在现实中却无法观察到(谢宇, 2012)。因而，事后解释、因果倒置、虚假相关在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解读中比比皆是。

由此看来，对于社会现象的特征及背后的机制即便涉及的是“常识”议题，要准确了解这些“常识”也并非易事，更不必说那些关于中国社会的“常识”正在发生变化。定量的数据和分析方法为分析社会现象的总体异质性和观测社会变迁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数据和统计模型能完全解答问题或是唯一正确可行的研究方案，而是基于严格抽样的代表性样本和系统采集的数据更可能帮助我们了解现象在总体中的分布及其变动；追踪数据配合恰当的统计分析方法也更可能帮助我们检验对因果关系的假设及认识因果推断的不确定性。

但我们在推进定量研究时要避免落入“统计至上主义”的陷阱，要重视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的指导作用，用理论和框架来指导并不是要照搬西方的理论或框架，或是把西方的研究用中国的数据复制一遍，而是要回到中国具体的社会情境(包括中国文化)来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和解释发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本文一开头提到的两类学者的长处相结合——既要具备“中国通”对问





题的洞察力和敏锐感,但同时要用规范的、客观的定量数据及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的独特性。

中国正在经历变化,有的人发掘问题,有的人提供解释,有的人贡献批判,有人找出对策;而在这场分工中,我们的学术工作正是为他人提供其需要的“常识”数据——我们以专业的态度做我们分内的事情。

参 考 文 献

Xie, Yu. 2011. “Evidence-Based Research on China: A Historical Imperative.”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4(1):14—25.

Xie, Yu and Xiang Zhou. 2014.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111: 6928—6933.

Xie, Yu, Xiaobo Zhang, Qi Xu, and Chunni Zhang. 2015. “Short-term Trends in China’s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Household Surve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8:235—251.

边燕杰,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12,《思考,快与慢》,北京:中信出版社。

谢宇,2012,“因果推理”,《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谢宇、胡婧炜、张春泥,2014,《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设计与实施》,《社会》第2期。

